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总编 李忠杰
副总编 周勇 李蓉 姚金果

红岩精神研究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主编 周勇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总编 李忠杰
副总编 周勇 李蓉 姚金果

红岩精神研究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主编 周勇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岩精神研究/周勇主编;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98-0267-0

I. 红… II. ①周… ②中… III. 革命传统教育—研究—中国
IV. D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751 号

书 名:红 岩 精 神 研 究

主 编:周 勇

编 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王 兵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162mm×230mm 1/16

字 数:258千字

印 张:17.25

版 次: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267-0

定 价:35.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总序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历史的重要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央工作机构,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党组织的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于前期筹建的“长江沿岸委员会”基础上,在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全面领导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底,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

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至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其间,南方局实际存在大约八年之久,先后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王若飞等担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在这一时期内,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包括云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等)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南方局的历史,与此前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之后的中共中央南京局,以及东迁后在重庆建立的四川省委,还有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关系。因此,南方局的活动,基本上

涵盖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历史过程,它的光辉历史和卓著功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南方局把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进行艰难复杂的谈判和合作,与国民党内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广泛争取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配合抗战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又配合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参与政协会议和停战整军谈判,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前景做出了不懈努力。

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主动与各中间党派广交朋友,与他们风雨同舟,促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等的建立;团结民族工商界投身抗战民主,支持他们反对官僚资本、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他们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中不断进步,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团结海外侨胞,争取他们对民族抗战事业的支援;抗战胜利后,发动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运动,适时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南方局充分利用公开文化机构,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以雾季戏剧演出冲破顽固派的文化封锁,掀起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高潮;关心保护爱国知识分子,组织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香港大营救;鼓励进步知识分子开展社会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新中国储备建设人才;领导《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坚持“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宗旨,使之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南方局的文化工作极大增强了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造就出一支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

南方局配合中共中央领导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游击斗争,指导建立和发展广东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以及南路人民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开辟了敌后根据地;领导粤、滇、黔边、粤桂边、闽粤赣边等地武装斗争,使之不断发

展,壮大为成建制的正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建立功勋;领导地方党组织深入农村开辟工作,掌握部分武装,以应对日军入侵和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开展军事统战,推动国民党爱国将领参与抗战和支持民主,进而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

南方局把以工、农、青、妇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通过抗日宣传、募捐献金、战地服务,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反汪”运动、宪政运动中动员群众;按照“三勤、三化”要求,深入群众,建立据点,积蓄力量;动员群众参与反对“一党国大”的斗争,在领导胡世合运动中迎来抗战胜利;领导一二一运动,促进政协成功,在和平民主运动高潮中推动进步群众组织的建立;在领导群众求生存、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特别是1945年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成为我党独立外交的重要开端。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空间,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方局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始终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思想上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组织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工作上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党的组织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稳住了脚,使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成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带领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和平民主的中坚力量。

历史充分证明,南方局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胡乔木同志曾经

指出：“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宋平同志也曾经总结道：“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做了非常有成就、非常出色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党的建设，从秘密工作到公开工作；统一战线，从基层到上层；文化战线工作，都做了很多工作。这些经验，在党的历史上确实非常宝贵。把这些经验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加以整理，加以提炼，就会丰富我们党的历史宝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光辉业绩、积累的丰富经验、培育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4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南方局的历史功绩和丰富经验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中共党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导和原南方局所辖省区（市）党委支持下，成立了以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棠等部分南方局老同志为核心，有关地区党史部门业务人员为骨干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开始进行南方局党史资料的征集与编研工作，并很快在史料征集方面取得成效。1985年，经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意，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与有关地区党史部门共同确定，合作编纂六卷本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并纳入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系列，由此正式拉开南方局党史资料编研工作的帷幕。1990年6月，在中央及相关省区（市）党委的支持下，经过南方局老同志与各省区党史部门四年有餘的努力，由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的六卷本《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正式出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座谈会。此套资料丛书的出版，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宣传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1990年初,完成使命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宣布撤销。

2002年5月和10月,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先后到重庆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南方局历史功绩,深刻阐述红岩精神,要求认真总结南方局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同年10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遵照中央领导指示,提出《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中秘局[2002]97号),批复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以及重庆市委等有关省区(市)党委,部署开展新一轮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编和研究工作,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和省区(市)党委的高度重视。

2004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长沙召开协调会,就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开展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提出初步意见。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重庆市委有关领导在京向宋平同志做了汇报,得到肯定和支持。同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委在重庆联合召开纪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座谈会等活动。宋平同志专门发来贺信,鲁明、张颖、成元功等老同志以及相关省区党委负责人应邀参加,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镇东出席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根据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正式成立了以宋平、荣高棠、童小鹏等为顾问,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为组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有关负责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安徽、江西、贵州、重庆等省区(市)党史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建立了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内设的工作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提出了继续修改完善《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稿》,协作开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专题类书稿编写,以及选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等任务,并决定首先启动丛书专题类第一期六本书稿(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的编写,以最终形成丛书“一主九专”结构的工作计划;确定了每年召开一次工作小组会议(由各成员单位轮流承办),以加强交流、研讨问题、检

验进度、部署任务的工作模式,并以《会议纪要》将相关任务固定下来。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南方局历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会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作出重要批示:“就是要通过我们扎实有效的工作,让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发扬光大。”

自此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由李忠杰副主任负责,进一步加大了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的领导力度,从整体上统筹协调和组织部署每年的工作任务;有关省区(市)党委及党史部门认真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和重庆会议确立的任务,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人力物力上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工作小组办公室也切实履行职责,在信息沟通、工作协调、档案查阅以及会议组织等方面提供大量服务。2005年11月、2007年6月和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相继在昆明、武汉、重庆召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李忠杰每次都亲自出席,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和《丛书》编写工作提出指导性原则,把关定向,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同时检查工作进展,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提出明确的任务要求。每次工作会议主题突出、任务明确,对涉及南方局历史的重要问题展开研讨,充分交流意见,最后达成共识。这些工作会议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务实、认真、和谐、高效”的风格,并一直坚持至今,从而保证了以《丛书》编写为主体的南方局历史研究按预定计划顺利推进。正是由于坚持这样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作风,南方局的历史资料研究和编写工作一直保持着“年年有部署、年年有检查、年年有推进”的良好局面。

如何统筹规划丛书编写工作,保证丛书质量,是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一直注意的中心问题。每次工作会议,都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李忠杰副主任在2005年的昆明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编写工作的九条意见、要求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强调体例结构要坚持“横向展开,纵横结合,脉络清楚,反映全貌”的总要求,丛书各个专题之间要坚持“大系统、多侧面;大统一,小灵活;大分工,小交叉”的分工原则。在2007年的武汉会议上,又根据编写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在2008年底的重庆会议上,针对审稿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九条处理意见。历次工作会议对这些原则和要求都达成了完全的共识。经过各成员单位近五年的努力,现已编写完成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较好地遵循和体

现了这些原则、要求和意见,达到了“主题鲜明,观点正确;系统完整,结构合理;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表述准确,文字流畅”的要求。丛书集中反映了十几年来在南方局历史资料征集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进展,比较好地搭建起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

现在,这套承载着南方局老同志的多年期望,寄托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凝集着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者们长年心血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终于出版了。这套丛书,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为主干,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等一期专题类六部书稿为支干,连同此前已经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回忆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集》等书,共同构成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基本成果,是迄今为止对南方局历史及其功绩、经验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总结,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协作开展中国共产党专史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是党史工作者历史责任和攻坚克难敬业精神的凝聚。在此之后,我们还有若干专题书籍需要继续完成并出版,在成果转化上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但这一次这套《丛书》的集中出版,标志着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完成了主干工程,取得了决定性的成绩。

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我们全体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党所尽的历史责任,也饱含着我们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之情。我们谨以这套丛书,献给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2009年5月

前 言

红岩精神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坚持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实际斗争中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

—

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化、追求崇高精神的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和合统一、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继承人,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进程中,先后培育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这些革命精神,不仅实现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之树重现生机,更成为推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胜利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

任何“精神”都植根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存在和必然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观念形态的发展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红岩精神,它的产生同样有其根源。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加

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需要,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始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长达八年的斗争历程。在极其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带领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力量,积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与抗日根据地军民相互配合,在粉碎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几度力挽抗战危局,维护团结抗战大局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南方局积极配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和中共代表团工作,在掀起民主运动高潮过程中发展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的建立,把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开创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和革命斗争中,努力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民族气节的融汇与统一,以自己的率先垂范和人格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培育形成了一种代表成熟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崇高信念、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的革命精神。“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正因为此,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驻地红岩村(原红岩嘴13号),便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含义,从这里发祥的革命精神,便具有了独特地理含义与革命象征意义相统一的称谓——红岩精神。而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是红岩精神的培育者,也是红岩精神的践行者。正因为此,才有在红岩精神感召下,国民党统治区一大批进步青年抛弃优越的家庭环境,义无反顾地追随真理,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才有解放战争时期歌乐英烈们的慷慨悲歌,以青春和生命弘扬红岩精神的英雄壮举。

南方局在红岩村创造的伟大业绩和光荣历史,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就载入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同时,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培育的红岩精神,早已融入周恩来、董必

武等共产党人的人格风范里,镌刻于南方局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历史业绩中,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一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红岩精神以其无比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教育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今天,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红岩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作为能与当今时代精神紧密结合的道德范式,依然能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提供精神力量。

红岩精神的夺目光彩和巨大作用是一个客观历史存在,且贯穿于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初期的整个历史进程。但是,“红岩精神”这一概念却是经过几十年风雨历程之后才提出来的。1985年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原南方局领导成员之一的邓颖超重返红岩,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写下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正式提出了红岩精神的概念。

199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第一次视察重庆,在瞻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后,他高度评价了南方局的伟大业绩和崇高精神,并亲笔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前进”。2002年5月,江泽民第四次视察重庆,就红岩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指出:“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江泽民的讲话,是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培育,邓颖超提炼的“红岩精神”的第一次理论阐述。他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党的历史和民族历史上的地位,深刻指出了“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全党全社会的巨大作用,从而把弘扬红岩精神等中国共产党缔造的革命精神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求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胡锦涛的讲话,是在十六大召开前夕,针对党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和政治考验,为发扬红岩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继承党的光荣传统,保持党的先进性,永葆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以继续带领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提出的伟大号召,不仅蕴含着与时俱进、勇于开拓的时代精神,更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二

作为一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课题,对“红岩精神”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南方局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南方局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广大中间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建立了不朽功勋;南方局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文化工作、群众工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红岩精神作为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精神风范和南方局历史业绩的生动体现,其鲜明的历史特点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以及所拥有的重要历史和理论价值,都蕴藏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的斗争实践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反映,这集中地表现在南方局党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上。

近十几年来,随着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发掘,南方局历史的价值日益为人们所知晓,特别是红岩精神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越来越为党和群众所重视。在这一背景下,时代提出了学习弘扬研究宣传红岩精神的任

务。1996年,重庆市委首次对“红岩精神”进行理论概括,开展了“弘扬红岩精神,培育当代重庆人”活动。2001年,在建党80周年之际,重庆市举行了第一次“红岩精神研讨会”,推出了一批理论成果,特别是提出了“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的新观点。同时,党史研究和宣传思想战线发挥自身优势,紧紧围绕红岩精神的研究宣传开展工作,努力实现研究成果向宣传成果的转化,一批宣传和歌颂南方局历史功绩、红岩精神的文艺和影视作品也相继出现。

为了贯彻落实江泽民、胡锦涛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深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宣传,2002年10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批复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并抄送中央档案馆和重庆等有关省区市党委,明确提出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组成由重庆及有关省区党史工作部门共同参与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联合开展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有关课题的研究,从而使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宣传工作推向全国,进入新的阶段。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指导和原南方局老同志的关怀下,重庆市党史研究和宣传理论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胡锦涛讲话精神,围绕中办秘书局批复所提出的具体要求,理清思路,突出特色,突出重点,与有关省区党史部门精诚团结,密切配合,协同攻关,在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宣传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学术理论成果。

随着红岩精神在全国影响的扩大,与南方局历史及红岩精神有关的研究,成为了党史学界和社科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不少专家学者紧紧围绕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实践基础,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现实意义等选择课题,进行深入研究,陆续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与党中央总结概括的我党历史上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相比,理论界对红岩精神的研究既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从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党史等角度,全方位探讨红岩精神产生、形成、发展过程的研究成果还未出现,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著述还不多,由此,客观上影响了学界以及社会上对红岩精神在宣传上的准确把握;影响了对南方局历史功绩以及对红岩精神历史、现实价值的科学认

识;影响到红岩精神在加强党的建设,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应有作用的充分发挥。

为此,2004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联合在重庆举办了“纪念中共南方局成立65周年座谈会暨红岩精神研讨会”,这是一次全国性展示红岩精神研究最新成果的盛事。这次研讨会动员全国理论界的力量,推出了一批有较高学术质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对红岩精神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大大地向前推进了,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红岩精神研究也从重庆走向了全国。

以此为契机,为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正式成立,并召开了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制定了研究规划,《红岩精神研究》成为重点课题之一。2005年,经国家社科规划办批准,《红岩精神研究》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红岩精神研究》作为“中共党史”及“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的一个研究项目,被党和国家部门确定为“双课题”。这足以证明党和国家对“红岩精神”开展学理性研究的重视与支持。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党史工作肩负着“资政育人”的使命。对“红岩精神”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构建“红岩精神”的理论体系,有利于全面地准确地把握“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把认识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南方局历史的研究,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填补对中国革命精神研究的空白;有利于提高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信念、加强修养,成为永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极好教材;有利于运用这一精神财富指导实践,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有利于更好地发掘与运用革命文化资源、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品格,弘扬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总之,这是推动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伟大实践的呼唤,是落实好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红岩精神”,发挥好资政育人作用,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的具体举措。

三

要正确地研究和宣传红岩精神,必须从认识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入手。本书的主旨,就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

果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突破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方式,在全面阐述红岩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时代条件、实践基础的前提下,从史学的深度和哲学的高度,对红岩精神的本质、特色等丰富内涵,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精神的内在关系和历史传承进行深入探讨,且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要求,密切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站在新的高度上,对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时代意义、理论价值、实践价值等重大问题进行探索性的新阐述和新提炼,以展示近年来我们在研究红岩精神方面所形成的新的学术观点,进一步推动红岩精神研究和宣传,使之更好地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动力。

本书拟阐明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力图阐明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

红岩精神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相连,与南方局所处的特殊环境、所进行的特殊的斗争紧密相关。

——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领导的革命斗争和进行的革命实践,是红岩精神得以产生的时代条件。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长期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抗战团结大局,推进了抗战民主进程,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做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南方局结合国民党统治区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在党的建设、文化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红岩精神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

——在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集体率先垂范、亲自培育了红岩精神,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实践和弘扬了红岩精神。红岩精神与同时代产生的延安精神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治路线走向成熟的精神风貌。

2. 力图阐明红岩精神的文化渊源与理论来源。

红岩精神蕴含了与其他革命精神相同的本质。“红岩精神充分体现